

# 流动博物馆奔赴草原 文博“乌兰牧骑”驰骋戈壁

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 
记者 蒋肖斌

在内蒙古自治区，从东经97度的阿拉善戈壁荒漠到125度的呼伦贝尔林海雪原，一辆蓝白相间的大车都曾驶过。它搭载着几位风尘仆仆的伙伴，还有上千段贮藏在电子设备中的、这片土地苍茫而鲜活的历史。

早在1957年5月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（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）派出工作组到各地进行文化调查。许多地区交通不便，居民点极其分散，要丰富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，就必须建立一种装备轻便、组织精悍、人员一专多能、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。

“乌兰牧骑”诞生了，其原意为“红色的嫩芽”，即红色文化工作队。今天，文博战线也有自己的“乌兰牧骑”——内蒙古博物院流动数字博物馆，近日获评2024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。

这辆蓝白相间的数字展车，就是在文博战线的“乌兰牧骑”流动舞台。

## 东西南北，送去了什么

内蒙古博物院的流动数字博物馆项目始于2013年。

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《内蒙古自治区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，内蒙古自治区2013年城镇人口总数为1468.8万人，乡村人口总数为986.5万人；边境线沿边一线共有20个边境旗市区，面积61.9万平方公里，总人口180余万人。

当时，乡村虽已普及广播、电视、图书等公共文化服务，但博物馆文化资源相对匮乏，文物因运输安全等问题，无法到达基层，在边境地区，这种情况则尤为明显。

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副部长石瑛表示，内蒙古地域广，公共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，流动数字博物馆的初衷，便是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惠及基层百姓，



2024年3月27日，流动展车来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。受访者供图

将博物馆送到百姓家门口，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。

内蒙古博物院历时3年，对1000余件珍贵文物进行三维数字化，打造了全国首创的高新技术集成的流动数字博物馆。流动数字展车配备高清显示屏、互动触摸屏、多媒体音响系统等，设置不同的展示区域，如文物数字展示区、文化体验区、互动交流区等。VR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文物所处的历史场景中；AR技术将虚拟的文物信息叠加在现实环境中；3D建模技术高精度地还原文物原貌，方便观众进行全方位的观赏。

内蒙古博物院规划发展部数字化科科长、研究馆员李丽雅介绍，这项技术有几个优势：一方面，保护文物安全，避免因多次搬运而对文物造成损害；另一方面，更贴近观众，在播放数字三维文物的时候，增加观众对文物的兴趣。在这背后，还有专业团队对文物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，撰写详细的研究报告和解说文案，支持后续的展示和传播。

历史文物有了“电子灵魂”，就可以更“轻盈”地去往边远山区、革命老区、农牧区以及边防哨所、厂矿、学校，还可以根据不同巡展地的背景和需求，从成百上千件文物中快速筛选组合，形成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展览。

石瑛回忆，每次巡展路线是先确定出行方向，“从呼和浩特出发，是去中部、东部还是西部”，然后确定行车路线和巡展地



2024年4月28日，流动展车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旗温都尔镇，讲解员徐晓旭引导孩子将卡片文物放在摄像头下，文物会立体呈现在屏幕上。受访者供图

区，再与当地文物管理所联系，商议最有效的巡展点。

自2013年5月18日首次展出，至2024年，该流动数字博物馆已深入内蒙古12个盟（市）的103个县（旗），累计展出420场，行程超4万公里，随车开展社会教育活动199场。

## 酸甜苦辣，遇见了什么

“生活在较偏远地区的观众，在展车到来之前，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展览手段的。”多年来随展车出远门的讲解员红格尔说，“我们都是深入苏木、嘎查（蒙古族对行政乡和行政村称谓——**记者注**），到草原去，到农户牧民的身边去。他们感到很新奇，也非常重视，很多人会盛装打扮，穿着华丽的蒙古袍、戴上头饰，来参观。”

“孩子们也是如此。我们的大车一开进学校，他们就欢呼雀跃。这个车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，我们把车打开后，他们更是眼睛发光。”另一名讲解员斯琴塔娜说。

因为年龄小，又没有接触过文物，孩子们最初只是对这些电子设备感到好奇，他们走来的时候，在讲解员的指导下左滑右滑。“但是在他们触摸滑动的过程当中，也会对数字展品产生好奇。”斯琴塔娜说，“孩子们会问，阿姨，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呀？这时我们就会抓住机会告诉他们，这个叫文物，这是来自博物馆的非

常珍贵的文物，如果你读懂这个文物，你就懂一段历史了，你说你厉不厉害？”

“孩子们会接着问，阿姨，那这个文物是干什么用的？它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呢？真的是金子做的吗？古人是怎么做的呢？”斯琴塔娜就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把古人制作的工艺解释给孩子听。

红格尔回忆，许多孩子对马具类的文物尤其感兴趣，“很多孩子确实能在生活中接触到‘男儿三艺’（骑马、射箭、摔跤）。他们看到漂亮的、金银材质的马具，眼前一亮”。

除了大车上的展览，工作人员也会在乡村学校开展“欢乐大课堂”活动，题库会根据参与者的地区、年龄而更换，分历史文化类、民俗类、革命类等。带孩子们了解蒙古族摔跤服时，工作人员还会穿好服饰比画两下。

“小学生会在留言簿上写观后感，都是简单的话，如‘我好喜欢’‘我想去博物馆’‘想让妈妈带着我去’……我也出生于旗县，看着他们，就像看着当年的自己。”斯琴塔娜说。

展车来到中学和大学时，对历史感兴趣的青少年就多了。他们会联系自己在课堂上的知识，和讲解员交流，比如，哪件文物借鉴了唐代风格，辽代的文物又有什么特征。

内蒙古博物院藏有自治区各地出土的文物，这些文物被数字化后，也随展车“回到家乡”。红格尔记得，在赤峰展展时，观众



2014年8月，内蒙古呼伦贝尔，讲解员红格尔和小朋友一起体验增强现实（AR）技术呈现的文物互动。受访者供图

看到出土于当地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、陶器，了解到文物原件还在国家博物馆展览，非常激动自豪。

“许多牧区的爷爷奶奶，可能没上过几天学，也没走出过这片牧场，所以我们会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。爷爷奶奶很有热情，有的已经弯腰驼背，还是很努力地走来，登上台阶，进到我们的展车当中。”斯琴塔娜说。

乌兰牧骑被农牧民亲切地称为“玛察（我们的乌兰牧骑），乌兰牧骑队员则被唤作“玛察呼和德（我们的孩子）”。流动数字展车的工作人员们有着相似的经历。

让斯琴塔娜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次在呼伦贝尔的一个牧区，一位老额吉在展车门口脱了鞋才进去观看。她说：“刚放完羊，从羊圈赶来的，我怕弄脏你的车哦。”“我说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打打，就怕你凉。她说不怕，我就想着不要弄脏你们的车。”斯琴塔娜说，还有一些牧民担心自己手脏，不敢碰屏幕，每到这时，讲解员们就会引导大家“放心摸”。

“他们非常淳朴善良，会说，姑娘你來家里吃顿饭？有些阿姨直接会抱住你，亲亲你的脸颊说，姑娘辛苦了，这么远赶来。”斯琴塔娜说，老人们也会用“乌嫩高要（真好看）”等蒙古语情不自禁地称赞。

## 春夏秋冬，带回了什么

巡展年复一年，队伍在路上遇到过不



姚明

在硝烟弥漫的抗战记忆长廊里，一部融合热血传奇与民族史诗的特长篇小说——作家知侠于1954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，激荡了数代中国读者的心灵。这部以鲁南铁道大队为原型的英雄叙事，不仅是烽火年代艺术化再现的典范之作，更是一部解读民族精神坐标、洞悉人民战争伟力、传承红色血脉的鲜活教科书。

## 创作的种子萌发于战火前线

知侠创作《铁道游击队》的种子萌发于战火前线，其初始素材积累与革命实践不可分割。1943年夏天，担任山东抗日根据地《山东文化》杂志副主编的知侠前往鲁南游击区参与武装斗争表彰大会，首次接触铁道大队的传奇人物徐广田、杜季伟等。会后，他便迅速整理材料，草创《铁道队》小说在《山东文化》连载了两期。

之后，他深入铁道游击队及其战斗过的地方采访。在与游击队员们同吃同住、并肩作战的数月间，他亲历了飞车夺机枪、奇袭鬼子运钞车等惊险战斗，并在游击队员

的身体掩护下，伏于微山湖畔麦田躲避日军扫荡。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使他对铁道游击队的战略价值与英雄品格形成了切肤认知。至1949年前，知侠已积累了30万字珍贵素材。

1953年，已经在山东省文联任职的知侠，以发掘优秀抗日题材作品专项创作研讨为契机，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系统重构，强化了政委李正所代表的党的领导核心作用，深化了刘洪、芳林嫂等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。

1954年定本，删减了部分个人英雄主义的战斗描写，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与军民鱼水情的整体渲染，使鲁南铁道大队的形象更契合新中国初期对“人民武装英雄集体”的期待与要求。这个由作家个体记忆上升为国家叙事的文本定稿过程，使其从民间传奇升华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的革命文学经典，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“革命历史小说”创作范式的代表作之一。

自1954年出版后，小说又进行了多次修订，产生了1955版、1959版、1965版、1977版和1978版等多个版本。有对语言风格进行白话优化，有依据当年未使用素材和健在队员口述对战斗细节的补充。小说还被翻译成英文、俄文、日文等10种文字，



《铁道游击队》作者知侠获赠茅盾的版本，中国现代文学馆藏。作者供图

传播到世界各地。迄今，《铁道游击队》小说畅销达400多万册。

小说还被改编、续编或新编成近10部同名文艺作品。其中，1956年电影热映，插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传唱大江南北，让亿万观众痴迷、陶醉，在几代人心里留下了美好记忆。

## 传统江湖侠义精神的创造性转化

《铁道游击队》编织了一幅壮阔的人民

战争图景。小说从日军占领枣庄煤矿引发百姓血泪抗争，写到1945年铁道队员在受降日军时的胜利时刻，贯穿抗日战争的全程脉络。知侠独具匠心地以铁路线为地理轴心，串联起夜袭洋行、血战庄店、六里石诱敌、湖上反“扫荡”等关键战役场景，形成点线交织的叙事网络。

其情节推进，既呈现了抗日战争中“基本的是游击战，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”的战略逻辑，更以高度戏剧性的“爬火车”“炸铁轨”“劫机枪”场景，构成悬念高潮迭起的叙事链条。这种将宏大史观嵌入传奇历险的结构模式，既满足大众审美期待，又保障了革命叙事的庄严性，成为革命英雄主义美学的典范。

真实历史人物群像，在小说中实现了个性化艺术典型再创造。刘洪的勇猛刚毅、李正的智慧忍忍、王强的缜密机警，以及芳林嫂的胆略忠贞，均源于铁道大队的真实英雄，但又超越个体经历，进行了艺术提纯。

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，知侠特别重视从生活细节揭示精神世界。比如，刘洪从为兄复仇的矿工成长为革命指挥员的心路蜕变，王强潜入敌营当装卸工时装装抽烟观察地形的生活细节，均以现实主义的手笔

增强感染力。小说避免了高大全式的概念化书写，通过对英雄们烟火气的生活描写，彰显血肉丰满的真实质感。

民间文学语言与地域风情的融合，造就了点线独特的审美境界。小说大量运用山东鲁南方言的鲜活对白，如“俺”“咋办”“乖不乖”等；巧妙融入地方民歌元素，将“琵琶节奏像机关枪似的，弹出我们飞车夺机枪的豪情”这类充满民间韵味的诗化语言，编织进叙事。

微山湖芦苇荡中游击船队的隐现、枣庄炭场风雪的肃杀、铁路沿高粱地的苍莽，构成地域景观的动态画卷。知侠将革命暴力美学与传统江湖侠义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，王强化妆侦察的智斗描写，带着《水浒传》的神韵；刘洪飞身劫军列的壮举，则唤起“劫富济贫”的侠义想象，使红色叙事获得深厚的文化心理认同基础。

## 穿越时空的火车头，承载着历史启示鸣笛向前

铁道游击队的敌后破袭，对日军战略动脉实施了致命切割。日军占领华北后，依赖津浦线运输煤炭、兵员，以维持战争机器运转。铁道大队执行的炸毁铁路百余次、颠

倒列车数十列、毙伤日伪军逾数千名的战绩，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。

小说中浓墨描绘的“劫票车”“取布车”情节，均源于真实战史，如游击队在颠覆日军货车获取西药后转送八路军，袭取布车缴获细布千余匹，解决了鲁南军民冬衣危机。铁道大队对战略物资的截断与转用，形成“日失我盈”的态势，其牵制作用使日军被迫增调兵力护路。这正是毛泽东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”战略思想的生动注脚。

小说对政治建军规律的深刻诠释，昭示抗战力量的精神源泉。有别于早期自发武装斗争，铁道大队是正式被纳入八路军苏鲁支队建制的，杜季伟等政工干部在队伍中建立的支部成为核心堡垒。知侠以李正为叙事焦点展现党的引领作用，从纠正“个人复仇主义”到灌输抗日民族大义，从严肃群众纪律到实行民主管理，终使游击队从“飞贼”升级为坚强的抗日武装。鲁南民众“最后一粒米做军粮、最后一块布缝军装”的支前热潮，也证明“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”这一真理。

《铁道游击队》从抗战烽火中一路走来，其文本生成扎根于民族救亡的伟大实践，版本流变映照时代精神的演进脉络，英雄叙事熔铸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高峰。鲁南铁道线既是一条被战火反复锻造的钢铁动脉，更是一条联结历史与当下的精神纽带。《铁道游击队》如一架穿越时空的火车头，承载着历史启示鸣笛向前。

（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）

杭侃

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，但龙长什么样呢？宋代的郭若虚在其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一《叙制作楷模》中说：

画龙者折出三停（自首至膊，膊至腰，腰至尾也），分成九似（角似鹿，头似驼，眼似兔，项似蛇，腹似蜃，鳞似鱼，爪似鹰，掌似虎，耳似牛也），穷游泳蜿蜒之妙，得回蟠升降之宜。

宋代的龙已经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龙的形象，它能够“穷游泳蜿蜒之妙，得回蟠升降之宜”的长长的身躯，一般认为取源于蛇。龙又被赋予了兴云致雨的功能，先秦的文献中就将其与水相连，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记，“龙，水物也”。

说起与龙相关的词语里，最不容易让人理解的，可能就是“龙马精神”了。马，是如何与龙在一起的呢？

## 马也看身高，一米八以上就是龙？

《周礼·夏官·廋人》说：“马八尺以上为龙，七尺以上为騊，六尺以上为马。”《周礼》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，战国一尺相当于23.1厘米，八尺是184.8厘米，七尺就是161.7厘米，六尺是138.6厘米。马匹个头越大，价格就越高。

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简牍中有很多关

一物

# 龙马精神，马是怎么和龙在一起的

于马匹名称、年龄、高度的记载，如“传马一匹，骹，牡，鬲须，齿八岁，高六尺二寸，名曰蜚骹”。“传马”是古代驿站系统中用于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专用马匹，“骹”特指鬃毛与尾部呈黑色的红马。这四名叫蜚骹的8岁公马高六尺二寸，这个尺寸指的是马的肩高。

现在蒙古马的肩高130厘米左右，单纯从马匹的肩高来说，蒙古马肯定算不上“龙种”。但是，蒙古马自有其优点，宋朝的大科学家苏颂曾经出使辽国，他在《契丹马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边城养马逐莱蒿，钱电都无出入劳。用力已过东野稷，相形不待九方皋。人知良御乡评贵，家有材驹事力豪。略问滋繁有何术，风寒霜雪任蹄毛。”

苏颂还给这首诗写了一个注：“契丹马群，动以千数。每群牧者，才三二人而已。纵其逐水草，不复羁绊。有役，则旋驱策而用，终日驰骤，而力不困乏。彼谚云：‘一分喂，十分骑。’晋汉人户，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。视马之形，皆不中相法，蹄毛俱不修剪，云，马遂性，则滋生益繁，此养马法也。”

宋朝“买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一寸七等中，各以一寸为差”。南宋初年，名将韩世忠买了一匹肩高五尺一寸的高头大马，宋朝的一尺是31.68厘米，这匹马肩高是161

厘米，韩世忠把它送给了宋高宗赵构，理由是“此马非人臣所敢乘骑也”。所以，连宋人都看不上“风寒霜雪任蹄毛”的蒙古马，但蒙古骑兵正是驾驭这种马，横扫了亚欧大陆。

## 人类太需要马，给马赋予很多想象

马和龙产生关联，不仅仅是马的高度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龙虚》中说，“世俗画龙之象，马首蛇尾”。说明汉代的龙首其实表现的是马头的形象。闻一多在《伏羲考》中，龙乃以蛇为主体，嫁接上“兽的四脚，马的头，鬣的尾，鹿的角，狗的爪，鱼的鳞和须”，龙（蛇）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，后来这个部落兼并了以马、鬣、鹿、鱼等为图腾的部落，就在蛇的身躯上再加上被兼并者图腾的某个部分，于是就形成了复合式的图腾。

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看原始社会中被我们讨论的一些“龙”的文物，则以红山文化出土的一种驱体蜥曲如“C”形的玉雕最为接近。今年6月，“龙腾中国：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”在上海博物馆开展，这是迄今规模最大、品类最全的红山文化主题展，汇集

了20多家文博机构的310件/组珍贵文物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“C”形玉龙。

考古学者郭物在《国之大事：中国古代战车战马》中就明确说“龙自草原来”，他认为“公元前35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有一种玉龙，其带鬃的头很可能就是以野马为蓝本”。

“马者，武也”，马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。马的出现，改变了冷兵器时代东西方文明的交往方式，北方民族“其富以马，其强以兵。纵马于野，驰兵于民”（《辽史·食货志》）。东汉名将马援说：“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安宁可则以别尊卑之序，有变则可以济远近之难。”所以，马在古代世界得到人们的普遍真爱。“五花马千金裘”，看看唐代人对马的装饰，可以说挖空心思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其实，这种宠爱和想象古人一直都有。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中的殉马，装饰奇特，有的马头上装饰了鹿角。公元前阿富汗希巴巴尔“黄金丘”出土的双马神金耳饰，中央是一位头戴斯泰泰式样的圆锥形帽的贵族，双手各握一匹似龙似马的动物，动物的鬃毛部分饰有绿松石镶嵌的水滴纹，它有长长弯曲的龙角，还有一对飞翼。所以说似马，是

因为它头部明显是在表现马首；之所以说它似龙，是因为它的身躯成扭曲的S型。

因为人类太需要马，所以给马赋予了很多想象的色彩。欧洲的神话里有半人马，下半身是马，上半身是人，她拥有人的智慧和马的疾速。西方古代雕塑中常能看到这一形象。

独角兽的原型是一匹纯洁的白马。巴亚尔是传说中的一匹马，它能根据骑士的数量，拉长或缩短自己身体的长度，这些想象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对“龙马”的理解。

## 龙自草原来

北方草原上是不是有八尺高的马呢？可能是会有的一则马种会出现变异现象，二来马种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。历史学家孙家洲在《“代马”意蕴及其演变》中重温了《淮南子》中“塞翁失马”的故事。“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，马无亡亡而入胡，人皆吊之。其父曰：‘此何遽不为福乎！’居数月，其马将胡骏马而归，人皆贺之。”说明代地（主要指今山西北部地区）之马和胡人之马，有着种群之间的交流。

而“代马”（代地培育的马种——**编者注**）却一直作为和平的象征，保留在古人的



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红山文化“C”形玉雕龙，故宫博物院藏。杨炯摄

意向里。如唐代崔颢所作的《雁门胡人歌》：“高山代郡东接燕，雁门胡人家近边。解放胡鹰逐塞马，能将代马猎秋田。山头野火寒多烧，雨里孤峰湿苦烟。闻道辽西无斗战，时时醉向酒家眠。”

不过，如果“龙自草原来”，那么它长长的身躯，表现的还是蛇吗？草原上有蛇，但都是体量不大的草蛇，很难将其与龙矫健的身躯联系起来。马是群居动物，苏颂就说过，草原上的匹野马群，动以千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匹高头大马嘶鸣在前，万马奔腾在后，扬起的滚滚红尘足够激荡人心。我劝天公重抖擞。